

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培育数字贸易竞争新优势

李俊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这是党中央顺应全球贸易发展趋势和国际分工演进规律,结合现阶段中国外贸发展现实需要作出的战略部署。随着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不仅持续赋能传统货物贸易和数字贸易发展,而且创造出了新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形态,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数字贸易蓬勃兴起,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在此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数字贸易在促进贸易提质升级方面的重要作用,抓住发展机遇,塑造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

顺应国际贸易发展趋势

数字贸易是全球贸易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我国贸易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的新动力,发展数字贸易对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大意义。

从国际看,当前全球贸易发展趋势正从传统的货物贸易、价值链贸易、服务贸易向数字贸易升级演进,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大对数字贸易领域的投入力度,力图抢占国际分工与贸易新的高点。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有效降低现有产品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和协调成本,而且能提供一系列新的可贸易产品及相应的

新的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开辟新的发展路径。我国要适应全球价值链的调整进程,在巩固传统贸易发展优势的同时,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培育数字贸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构建起新的贸易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从国内看,受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等影响,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面临一些挑战,稳外贸压力有所增加。发展数字贸易能够推动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知识、数据、服务等要素流动畅通,不断拓展服务可贸易的边界,扩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增强全球贸易发展动力。展望未来,加大力度发展数字贸易是我国稳定外贸发展态势、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对此,需要提高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跨境电商、贸易数字化等手段,帮助企业拓展市场,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贸易附加值。

深刻认识现实基础

当前,数字贸易正在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要深刻认识其面临的优势与差距、机遇与挑战,更好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

从发展优势看,我国具备发展数字贸易的良好基础条件。一是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较大,数字市场前景广阔。多年来,我国依靠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助力作用,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GDP比重提升至41.5%。二是数字贸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跨境电商出口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B2C跨境电商交易市场,2022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达到2.5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到2.1万亿元。三是数字平台企业综合实力较强,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产业链优势明显,相关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数字技术人才持续涌现,应用场景等资源要素较为充沛。

从发展机遇看,当前全球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为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和重大机遇。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产业和贸易发展拓宽了空间。物联网、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直播电商、移动支付、远程制造、智能机器人、大数据营销等新模式新业态持续涌现,跨境电商、云服务、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各类经营主体创新活跃,为数字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另一方面,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我国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等开放平台持续推进数字贸易领域改革创新,成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致力于对标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此外,我国大力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截至2023年9月底,中国已与五大洲30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带动提升沿线国家数字经济水平,也为我国数字贸易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空间。

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有很大提升空间。虽然B2C跨境电商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但B2B跨境电商发展相对滞后,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数字服务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低。此外,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国际竞争力不足,海外收入占比不高,全球创新资源配置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同时,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一是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需要进一步突破。二是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话语权较弱,在相关规则制定方面滞后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三是数字市场开放水平有待提高,需要更好统

筹发展和安全,提升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治理水平。

把准未来发展着力点

面向未来,我国要在数字化发展浪潮中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塑造新优势,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对外合作开放高地。

一是明确数字贸易发展的战略定位。加强数字贸易顶层设计,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支持数字贸易企业走出去,全力扩大数字服务出口。研究制定数字贸易重点业态目录,出台支持数字贸易相关的投资准入、财政金融、人才引育等政策。支持地方开展试点和示范,促进数据跨境安全、自由流动,在数字服务市场开放、电子发票和数字身份认证等方面先行试点。

二是实现跨境电商提质增效。持续推动B2C跨境电商业态创新,进一步增强消费品跨境电商优势,积极发展B2B跨境电商贸易,扩大与制造业相关的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等数字服务进口,以此推动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升级。鼓励跨境电商企业深耕行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带动生产端个性化、定制化发展。

三是加快推进贸易数字化进程。促进数字贸易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支持外贸企业在贸易开发、贸易撮合、贸易执行、贸易服务等全链条各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型,推进贸易供需对接、贸易服务平台、外贸基础设施数字化。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全球贸易数字化领航区,在贸易科技、发展模式、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先行先试。

四是数字平台企业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统筹发展和安全,协调好数字贸易监管与促进政策,进一步完善细化我国网络安全、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的合规指引,丰富企业数据跨境流动安全合规的渠道。加强开展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磋商与谈判,多渠道为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外部环境。

五是探索高水平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和标准。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推动数字贸易领域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助力数字贸易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应对不合理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加大数字贸易标准化建设力度。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数字贸易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以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人才资源的关键作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人口是人力资源的基础,也是我国人力资源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重要表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特征决定了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首先要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这对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在优化人口发展战略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更好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的关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

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要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现代化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种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实现人岗匹配、人事相宜和人尽其才。当前,我国人力资源利用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就业率还需进一步提高,有就业意愿和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开发潜力巨大,提升人力资源在城乡间、地区间和行业间的配置效率还大有可为。持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可以进一步激发广大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干事创业活力,让人才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以此为抓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要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人口红利是长期以来支撑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抚养比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需要进一步推动人口由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在一些科技前沿领域国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这要求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塑造“人才红利”,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人才资本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才政策精准化程度,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要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就业既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事关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培育现代化人力资源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受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影响,我国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稳就业工作仍需持续推进。迫切需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途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推动形成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有机协同、人力资源开发与实体经济联动发展的就业工作体系。以强化就业公共服务、保经营主体稳就业、抓好重点群体就业等,实现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结构更加合理、就业环境更加平等、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就业保障稳步提升。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钱

诚

绿色制造助力实现

供应链相关的规划给国内制造业企业带来了“双碳”目标带来的挑战。

对企业指导作用还有待加强。需采取务实举措切实推进绿色制造,使生产要素向绿色产业、低碳经济集聚集中,尽早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有效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推进绿色制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标准规范、政策制度、人才技术、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支撑保障。

在标准规范方面,要完善包括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企业和绿色产品在内的绿色制造评价标准体系,重点补充或强化企业碳排放核算与碳排放管理的相关要求,尽快制定各行业、各类产品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核算的规范和通用标准。

在政策制度方面,由于当前绿色制造产品的价格普遍高于同等性能的传统产品,仍需实施价格补贴、税收优惠及金融支持等举措,同时更好发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作用,引导下游消费者使用高品质的绿色产品,鼓励企业生产绿色产品,持续投入加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动形成绿色产品供需良好态势。

在人才技术方面,要发挥人才培养对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创新“双碳”科技和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加强有利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的人才培养。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传统制造业实现材料、工艺及流程创新,助力绿色转型。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统筹兼顾。当前绿色制造的发展更多倾向于对园区级绿电供应、智能配电网、能源梯级利用和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等基础设施的支持,未来碳排放统计监测与核算、绿氢供应、二氧化碳捕集等也将成为重要的低碳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要补齐短板并适度超前布局,帮助制造业企业实现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绿色转型。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强工业园区的新型低碳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创造更好的绿色发展环境。

(作者分别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双碳

目标

绿色低碳发展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建设。当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历史阶段,传统产业所占比重仍然较高,推动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制造业是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关键。大力发展绿色制造,不仅对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革新传统设计、制造技术和生产方式,提升绿色低碳技术、产品、装备、服务的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绿色制造是一种低耗、高效的现代化制造模式。从纵向看,这是在保证产品功能、质量且成本可行的前提下,将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要求贯穿于产品设计、制造、物流、使用、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以制造模式的深度变革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环境影响及碳排放最小化。从横向看,绿色制造涉及各行各业,既要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造纸、印染等传统制造业进行绿色化改造,也需要在信息通信、生物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领域大力推进。

近年来,我国积极适应和引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有关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和绿色产品等的评价标准陆续出台,绿色制造体系正初步形成。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底,国家层面共创建绿色工厂3616家、绿色工业园区267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403家,累计推广绿色产品近3万个,绿色工厂能耗水平整体优于能效标杆水平,绿色工业园区平均固废处置利用率超过95%。绿色制造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显现。

推进绿色制造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堵点和难点。大部分绿色制造评价标准都是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前制定的,对推进企业降碳的约束力度不足,支持企业开展降碳管理和降碳的制度安排还不完善。与此同时,一些国际贸易措施和绿色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

李大伟

后规则转变。这要求我们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政府采购等领域深化改革。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聚焦投资、贸易、金融、创新等对外交流合作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我国适应对外开放新趋势的战略抉择。

三是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商事制度、投资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有助于建设既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长远方向、又适应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是有利于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领域新模式不断涌现,相应领域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相关规则制定,增强与其他经济体的制度协调,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着更加公平、公正、透明、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发展机遇。

把握内涵特征

从内容上看,制度型开放是系统性构建满足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的规则体系。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

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拓展,通过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合作,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在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各领域全面系统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从范围上看,制度型开放正由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延伸和拓展。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并不高,对外开放大多以货物贸易和制造业利用外资为主,对接的国际经贸规则也集中于关税、外资准入等传统的边境规则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对外开放所涉及的规则范围大幅拓展,数据、创新、金融、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劳动者保护、补贴等方面的边境后规则对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着眼于这些领域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是当前制度型开放的重点所在。

从层次上看,制度型开放体现了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的深度融合。40多年来,改革和开放始终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深化改革有效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释放需求潜力,为我国对外开放合作创造了良好条件;扩大开放在吸引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经贸规则、管理制度等的完善。制度型开放涉及商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监管一致性、环境保护等重要改革任务,为形成改革和开放深度融合的良好局面提供重要动力。

明确推进路径

为更好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

趋势,要实施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接轨。

第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加快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协定,不断提升我国全球要素资源配置水平。

第二,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积极参与国际经贸领域相关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规则体系。充分利用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平台,在基础设施投融资、数字经济合作等领域与共建国家开展深度合作,打造国家和地区间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的示范性制度安排。

第三,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鼓励有条件的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在竞争政策、电子商务等规则上进行创新性探索,全方位、多角度推进规则谈判和规制合作,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围、提质、增效。

第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国际高标准、高水平为标杆,持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大幅度降低企业获得项目建设许可、获取信贷等方面的成本和时间,提升业务开展效率。在商事诉讼、商事仲裁,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加快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标准,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